

史料和历史科学

荣孟源著



史料和历史科学

荣孟源著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书名题字：启 功

史料和历史科学

SHIAO HE LISHI KEXUE

荣孟源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18,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书号 11001·907 定价 1.65元

序

《史料与历史科学》是荣孟源同志的一部遗著。著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熟悉近代史资料和其中的各种问题。历史资料中某些情况，近代、古代带有共同性。著者广罗博采各种文献，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触类连及，互为印证，往往见出深意。《史料与历史科学》出版，直接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时，在史科学与历史科学的论述上，记载了现在学术界的一种观点，一种认识。

荣孟源同志参加革命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都比较早，但经历的挫折相当多，而且绵延时间格外长久。他1931年进入北平中国大学读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先后在中国大学任教，受到许多青年欢迎。他选读历史，听吕振羽讲授原始社会等课程，为吕老及门弟子。1936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以后，发展、联合其他同志建立起家乡山东宁津县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家乡人民一直把他看做宁津县的建党人之一。1942年，他在延安边区师范任教。因为一件具体的事向党中央控告高岗，被开除党籍，全党通报。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又受到错误对待。其时我主持近代史所日常工作，是直接责任者。一个献身革命的人，忽然背上那种政治包袱，思想深受压抑，自不待言。“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他也未能幸免。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度过了那段岁月。荣孟源同志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大部分就是在上述那种情况下作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孟源的党

籍得到恢复,不再存在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了。他更奋力写作。短短几年里,出版了《蒋家王朝》、《历史笔记》等作品。遗著除《史料与历史科学》以外,《隋唐五代历表校记》杀青成册,只待付梓。《史通校注》经过一再修改,留有清稿。历表的研究中,关于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各代历表资料,收集大致齐备,再加整理,不难成书。合拢他已刊未刊的全部著作、资料,数量可观,涉及的面广。他的全部学术工作,让人明显的看出,其中贯穿着一种精神:拒绝在困难面前低头,坚韧顽强,为人民事业执着奋斗的精神。

孟源从开始跟吕振羽同志学历史,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客观世界的变化空前深刻迅速,人们认识的变化也空前深刻迅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看法显得过时,丝毫也不足为怪。不那样,反倒不可思议了。他在《历史笔记》的前言中特地声明,自己不存在先见之明,没有认为过去讲的都正确无误。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在基本理论上,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领域,近年各种问题的争论纷至沓来。那些辩难、争论多半促进研究深入。也有的文章怀疑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少数青年人以为讲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会形成框框,束缚思想。孟源旗帜鲜明,坚持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有人说他思想“正统”。所谓“正统”,如何随人随事而异,不去管它。这里的用法,有贬意,指保守、教条主义等;也有正面的意思,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等。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从者,永远是变革现实,改造世界。保守迟钝,食古不化,进一步退两步,与革命者的品质没有共同的地方。坚持基本原理与不断改革不适合历史前进的事物,对我们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从孟源的具体情况看,说他思想“正统”,不应当是表示保守、教条等等,而是说明他对党的事业怀有坚定信心,始终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

我和荣孟源同志共事，连续达四十年。第一次我们见面，是在1946年4月间。那时党中央决定创立的由范文澜同志担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已经筹备就绪，开始招生。校址设在文化一向比较发达的河北省邢台县。校舍利用南门外原来一处教会医院的房子，和抗日根据地办学条件相比，大为改观了。孟源夫妇抱着不满两岁的女儿，从延安分配到这里来工作。我作为教务处的负责人之一，最先出来接待他们。因为备战，1946年秋天，学校从平汉线上西迁至山西长治县。校部驻在县城北面三十多里的高庄。大约1947年初，范文澜同志接到中央宣传部的一个电报，要他聚集人材，继续研究历史。不久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范老自己主持，我和孟源开始同在这个研究室工作。这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叶丁易、王冶秋、尚钺诸位先后从蒋管区来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一时人材称盛。1948年夏天，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建成，吴玉章同志担任校长，校址在正定的华北大，并设立研究部。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为研究部的一个室，人员、工作大体照旧。1949年进入北京。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华北大历史研究室划归科学院，改建为近代史研究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起源演变经过，其中就包含我和孟源在一起工作的经过。1949年3、4月间，我因病留在正定。《美国侵华简史》那本小册子等着出版。范老、孟源等同志曾代为修订原稿，并写有简记。可惜那个本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孟源遗著中，《史通校注》稿子我没有亲见。但我们不止一次谈起这项工作。《史通》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理论著作。书上着重于批评前人，缺少著者正面、系统的主张。论述集中于史料，观点居其次，即重在“事”而不在“义”。但它对前史的批评，深刻中肯，千载传为名著。美文学的写作方法也增强了这部古典作品的传播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一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二要

通晓自己的传统,并且把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我关心孟源对《史通》的研究是这样想的,他也是这样想的。去年十月,我们同时住在协和医院五楼病房里。他那时病已沉重,脑子不清晰了。听说我做手术以后不能下地,由女儿扶着来看我。他付出过相当心血的《史通校注》肯定无法亲手卒业了。我建议请近代史研究所找同志帮助整理,尽快完成。他完全赞成。事后知道,那次谈话是他最后一次时间较长的有条理的谈话。《史通》一书,前代注释多家。清人蒲启龙用力尤深,号称集各家之大成。《史通校注》能否顺利整理出来,那只有取决于遗稿的实际状况了。但我总希望孟源的这个遗愿有一天见诸实现。

刘大年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庐山

自序

1948年秋，华北大学叫我讲史料问题，是我从事史料工作的开始。1949年来到北京，继续校勘范文澜同志《中国近代史》所引用的原始材料，并参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书的编辑工作，又重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编辑工作逐渐多于教书。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命我编辑，从此编辑史料成为我的专业。

《近代史资料》出版，到1984年是三十年，工作做得不多，错误犯了不少。为了惩前毖后，改进工作，应该总结经验。检查自己的工作，看看别人的工作，觉得应该总结的问题不少。一个问题通写一篇，从1960年起也零写过几篇。粉碎“四人帮”之后，修改旧稿，又新写了几篇，总共十五篇。前八篇谈对于史料工作的认识和基本方法，后七篇结合《近代史资料》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谈史料编辑的具体工作。其中六篇曾经发表过，还有两篇修改很多。应该总结的问题不止这几个，但是我没有能力再写了。这十几个问题不是一气写成的，也不是按照顺序来写的，拖拖拉拉过了二十多年，发表的几篇也陆陆续续经过了七八年，编辑在一起，有些话是重复的，虽有些修改，却无法净尽。最后出版社编辑提出了意见，只能是尽力修改。感谢编辑同志。还望同志们多多赐教。

荣孟源

1984年12月31日



作者简介

荣孟源(1913—1985),
山东宁津人,我国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生前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
级研究员、学术委员、近代

史资料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大辞典近代史分册主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著述有《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历表》、《中国历史纪年》、《蒋家王朝》、《历史笔记》等。

荣孟源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从事历史编辑工作,建国以后曾重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参加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书的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孙中山选集》。晚年负责主持编辑《中国历史大辞典·近代史分册》和大型史料丛书《近代稗海》。一九五四年《近代史资料》创刊以来,一直是这一刊物的主编,编辑出版了期刊五十九辑,专刊二十一种。

本书是作者从事史料编辑工作三十多年的经验总结。

目 录

序.....	刘大年	1
自序.....		5
史料和历史科学.....		1
史料分类.....		15
阶级分析.....		37
辨别真伪.....		58
考据.....		72
鉴别史料.....		87
考订记事.....		113
校勘文字.....		141
搜集.....		199
选材.....		213
注解.....		225
标点.....		234
题目.....		255
序跋按.....		263
图片.....		274
后记.....		283

史料和历史科学

一 历史、史学和历史科学

历史从人类出现开始。恩格斯早已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马恩全集》第二卷 374 页）

人类经过了多少万年的原始社会生活，不能用文字来记录历史。马克思谈到希腊历史时说过：“希腊人只是从野蛮期的高级阶段开始才知道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74—175页）世界各民族的情况大体都是如此。人类的历史开始了，可是没有史学。

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有了文字记录，经过一个历史过程才产生史学。我国从殷代起有甲骨文和彝器铭文记录历史事迹。西周彝器铭文所记录的事迹比殷代详细，有完整的文件，有编年式的叙述。这是一些散碎的历史记录，并不是史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史籍，其中绝大部分是周穆王以前的文件，大约编撰于西周中期，即公元前十世纪，后来又有所增补。司马迁撰《史记》，《十二诸侯表》记录具体年次起于共和元年（前 841 年）。《鲁世家》记录年数起于西周初年，大约我国有编年史就从这时开始或者略早，即公元前九世纪或十世纪。要把文件编纂成书，要撰写编年史，必然遇到如何选材、如何行文和如何立论等问题。

西周中期没有解决这几个史学上的重要问题，只能说是史学的萌芽时期。

孔丘因《鲁史记》以修《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据说隐公以前的事已不可闻知。可知鲁国有确切可靠的编年史起于公元前八世纪。《竹书纪年》记晋国的历史，具体年次起于晋殇叔（前784年），而以曲沃庄伯为正统（前725年曲沃庄伯杀晋孝侯，前678年庄伯子晋武公统一晋国）。可知晋国有编年史起于公元前八世纪。司马迁说：秦国在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孟轲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墨翟说：“吾见百国春秋。”（隋李德林《答魏收书》引文）这些材料说明，从东周开始，各国都编撰自己的历史。到了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丘修《春秋》的时候，确定了：“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就是说：选材要取齐桓、晋文那样的政治斗争事件。行文要用历史记录式的文体。立论要“以义断之”，即必须贯彻卫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点。公元前五世纪，孔丘解决了编撰历史如何选材、如何行文和如何立论等重大问题，我国封建主义的史学就正式形成了。

春秋以来二千多年，我国史学日益发展，不止叙述了东周以后的历史，而且还探索了西周以前的历史；编撰了全国史、地方史、民族史、家史、个人传记和各重大事件、各学科、各职业的专史，以及文献汇编等等史籍；创造了编年、记传、纪事本末、典志、谱牒、图表与各种杂史、野史以及考订、目录等等许多体裁；另外还有专讲史学的著作，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但是这些史籍都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之手，主要是为了使封建统治阶级“慎言行，明法戒”（《汉书·艺文志》），作为统治人民的前车之鉴（《资治通鉴序》）。所记载的既不是历史的全貌，更不符历史发展

的规律,它不是历史科学。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在搜集片段史实和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比封建主义的史学确有进步。但是它不曾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知人民群众的活动,仍然不是历史科学。更可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的生存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马恩全集》第十六卷 573 页)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史学替帝国主义服务,更为反动,更要伪造历史,更加传播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历史科学。

中国资产阶级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史学方面也曾指责旧史籍是“皇帝教科书”和封建士大夫的“必读书”,并非人民所需要的历史书;要求编撰“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梁启超关于“新史学”的文章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议论最多)。这样的史学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研究某些历史事迹方面,也曾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也不能建立历史科学。他们没有脱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仍然继续中国的和外国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传播“英雄造时势”、“英雄传即历史”等等谬论。另有一些买办洋奴如胡适之类,从五四运动时期起就贩运来了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谬种,反对历史科学。

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

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时说：“发现唯物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给我们“指出了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列宁选集》第二卷 586 页）这样，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就成为历史科学。

历史、史学和历史科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有联系，但是不能混淆。

二 我国史科学的发展

在没有史学的时候，自然没有史科学。从史学出现开始，为了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史科学也就出现了。孔丘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后人对于“文献”的解释，各有不同。汉郑玄说：“献犹贤也。”（何晏《论语集解》）宋马端临说：文，是经史、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的奏疏、诸儒的评论、名流的燕谈和稗官的记录。（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清焦循说：文是典籍，献是贤士大夫的记述。（焦循《论语正义》）清徐灏说：“载

诸典籍者文也。传诸其人者献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却都说“文献”就是文字史料和口碑史料。公元前五世纪孔丘提出了叙述历史要依据史料,应是我国史料学的开始。

秦汉以后,历史著作日渐增多,史料问题日渐被人重视。六世纪时梁刘勰提出:

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必阅石室,启金匱,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讳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谤说,旧史所无,我书则博。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

就是说,叙述历史要依据丰富的史料;实事求是的信史,不能用可疑的史料;严厉斥责穿凿附会的滥用史料。刘勰的话很简单,却提出了史料学上的重要问题。

唐代史学进一步发展,八世纪初刘知几撰史学专著《史通》,对于史料学的论述更为详细。其中《采撰篇》主要是议论史料问题,提出:撰写历史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广泛地搜集史料;使用史料必须辨别真伪,反对“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辨别史料必须根据作者的观点和著书目的来分析研究。例如对于沈约的《晋书》和《宋书》,要注意他“于晋则故造奇说,于宋则多出谤言”。对于魏收的《魏书》,要注意他“党附北朝,尤苦南国”。至于“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总之,刘知几进一步提出了史料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

宋、元、明、清一千年间,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工作日益发展,编辑了许多当时的文献,搜集了许多古代的金石和文件,辑出了许多古代的逸书,研究了许多古籍的真伪及版本源流,辨别了许多记载的是非,订正了许多文字以及解释的错误,还总结出许多辨

别各种史料以及考订和校勘的方法。特别是清代，史料学上的成绩是空前的，对于后来研究历史科学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种史科学是为封建主义的史学服务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刘知几曾经很坦率地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史通·曲笔》）一遇到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利的史料，为了封建主义的“名教”，即为了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不惜抹杀或者歪曲事实。这样的史科学不是科学。

近百年来，我国的史科学又吸收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在搜集和研究古代史料或近代史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史科学的旧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史科学本来都有消极的一面，即为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惜歪曲事实。中国资产阶级为其阶级性所限制，是不能摆脱这种消极面的。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西方已经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有一定的联系，自然而然就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史学和史科学，阻碍着我国史科学向科学方向前进。自从胡适之类公然贩运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史学和史科学进口以来，一些要求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也跟着喊什么“史学率是史科学”、什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些言论破坏着历史科学，也危害着史科学。

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历史科学，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史料工作。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恩全集》第二三卷23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谈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要求是：第一，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实践论》）第二，获得材料的基本方法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第三,对材料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整理工作,以找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最后,不是用一般形式逻辑来进行工作,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史料学提高到科学水平。

科学的史料学和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史料学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它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为历史科学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四卷 254 页)在搜集史料、研究史料和编辑史料各方面都坚持科学的原则,反对为地主阶级的“名教”、为资产阶级的赚钱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伪造篡改史料的旧史料学。

第二,它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恩选集》第二卷 82 页)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研究历史规律的关键,并不是要到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而是要到每个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社会的经济中去